**《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期中读书报告**

**题目：浅析历史认识中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错误**

**院系：国际关系学院**

**姓名：杨黎泽**

**学号：1200015147**

**日期：2013年10月30日**

**浅析历史认识中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错误**

**——《实践论》读书体会**

前不久在网上看到中国NLP学院导师戴志强的一段话，是这样说的：“地图不是疆域：没有绝对真实的世界，只有感官经验所塑造的世界。作为人类，我们永远无法知道真实的世界。我们只能知道自己从感官经验所“认知”的世界。我们原是透过我们的感官系统与这个世界互动。我们是从自己的“认知”的地图里面去理解世界，从中决定如何透过我们的行为来应对。所以，并不是世界使我们受到约束或加强了我们的知识与智慧，而是我们内在所认知的世界左右了一切。“

在第一次看完后觉得讲得挺有道理，我当时是想起了我的一位老师在给我们分析中国对外关系史时曾讲道：我们在分析任何事物时，不一定能从真实的、客观的世界出发。相反，我们大多是从我们所认识的这个世界的样子和我们与这个世界的关系来做出我们的判断和选择的。也就是说我们对这个世界的判断是建立在我们脑海里或者是潜意识里已经形成了一种对事物的看法和认知，从而基于这种已有的认识分析问题，而非在分析问题时是根据具体的、客观的、真实地事物来形成我们的认知。

因此后来再仔细反思时，觉得我们老师的观点主要是讲我们分析问题时已有的对世界的认识会影响你的判断和认知，而这种思维方式或许已经形成一种意识不到的习惯，从而继续延伸下去做为你判断的基础。但是戴志强这段话不仅仅体现对人类认识问题时的一个分析，同时我觉得其中更深层次的是涉及到对人类认识的基础以及根源的解释。因为我们在形成一种认识之前，我们已经形成一种世界观或认识论的潜意识，而这种潜意识的形成因素以及形成之后的变化发展是值得我们去进一步研究和深刻思考的。

《实践论》是毛泽东关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代表著作，当时的背景主要是中国共产党内部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错误思想使中国革命在1931年~1934年遭受重大挫折与损失。《实践论》就是毛泽东根据当时中国革命运动的实际情况，结合自己的观察何判断，为揭露这种错误而写的。该著以实践观为基础，在刚开始就明确的阐述了实践与认识的关系：人的认识，主要地依赖于物质的生产活动，逐渐地了解自然的现、自然的性质、自然的规律性、人和自然的关系；而经过生产活动，也在各种不同程度上逐渐地认识了人与人的一定的相互关系。[[1]](#footnote-1)紧接着，《实践论》具体地论述了实践在认识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这对我们认识在实践基础之上的认识的发展过程有很大意义。结合戴志强的的言论及观点，我们能够在形成对事物认识的过程中避免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而这两种主义，我认为它们最大的特点分别是主观性和片面性。

我们知道，教条主义亦称“本本主义”，它是主观主义的一种表现形式。它的主要特点就是把理论当教条，思想僵化；而经验主义则是形而上的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风，它的主要特点是在观察和处理问题的时候，从狭隘的个人经验出发，不是采取联系、发展、全面地观点，而是采取孤立、静止、片面的观点。这两种主义的一个共同特点就是都没有坚持实践的观点，分析问题时没有从实际出发，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做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毛泽东的这篇《实践论》则是明确地提出反对这两种主义。在当时的中国共产党内，这种思想的主要代表人物就是中共当时的领导人王明。历史证明，王明的思想路线是错误的，犯了严重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并且对中共后来的政策以及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在对二三十年代的世界政治形势进行分析时，以李立三和王明为代表的“左”倾路线思想认为在世界政治的各种矛盾中，主要的和起决定性作用的矛盾是苏联与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这种对世界形势的认识使当时的中国共产党人在理论上赋予了中国革命以三重历史任务：（一）推翻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在中国的统治，使中华民族获得彻底的独立和解放。（二）将中国革命视为世界革命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相信中国革命的发展会起到加速帝国主义的总崩溃作用，并成为“掀起全世界大革命的客观条件”，中国革命胜利会成为“世界无产阶级独裁制之胜利的序幕”。（三）由于将中国革命看作是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的“重要根据地”，所以认为中国的革命运动起着保卫世界革命的中心——苏联的作用。[[2]](#footnote-2)

结合当时的时代与历史背景来看，这种分析是错误的，它的根源就是片面夸大资本主义国家的危机和在世界出现革命运动高潮的可能性，夸大了中国革命运动在世界政治中的地位和作用。因为实际上，当时中国革命运动实际上处于低潮阶段，保存和积蓄力量才是中国革命运动的首要任务。

从理论角度来看，一方面是因为列宁和共产国际的理论思想影响着中共早期领导人对国际事务的认知结构。在当时反革命力量的严密包围中，中国共产党人对世界形势的变化和中国政局的影响等等问题的了解以及对世界政治及其发展趋势的看法，主要是受到苏联和共产国际的理论和政策的影响。且中国共产党从开始建立就一直受共产国际的领导，因此，中共领导人在理论和路线问题的判断和分析上，必然会延续共产国际和苏联的思维模式犯了经验主义错误，把共产国际的“世界革命理论”当作教条，思想僵化，从而对中国革命运动的判断和分析脱离了当时的实际情况。不仅如此，以王明为代表的中共领导人在对中国政局的认识上主观性十分强，在对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国民党之间的关系上过于“一厢情愿”，且加上后来苏联对中国的政策仍以苏联的国家安全利益为出发点而与中共在处理国共两党之间关系上的分歧，使得中共的政策出现严重的误判。这种错误的政策判断对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和中国共产党人的工作产生了严重的影响：一方面，中共党内那些“左”倾领导人极为不切实际地用实际上十分弱小且处于严重劣势的政治和军事力量，去推动并不存在的所谓的“世界革命运动高潮”。倘如不是1935年12月17日召开的瓦窑堡会议通过对国际和国内形势的具体分析提出了全面改变党的策略路线，这些“左”倾领导人在对世界政治的幻想中的高谈阔论和对中国政治力量对比基本事实的罔顾几乎会断送了中国革命运动的前途。

另一方面，以王明为代表的中共领导人对当时世界形势的变化认识不足，以至到最后出现严重偏差和错误。如何认识中国革命运动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尤其是与世界政治的关系，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中共对外政策的基本构架，无疑是决定中国革命运动的关键问题之一。[[3]](#footnote-3)由于不能合理地界定中国革命运动的民族性，夸大它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从属性，导致中共“左”倾领导人在处理中国革命运动本身肩负的民族解放使命与苏联对外政策的关系方面，在理论上更加荒谬，在实践上走得更远。他们甚至将当时由于日本入侵中国造成的民族危机，解释成帝国主义国家进攻苏联的序幕。因此，中共领导人将中国的任务规定为“反对进攻苏联和苏区，拥护苏维埃，武装保卫苏联”等等。[[4]](#footnote-4)这表明当时中共领导人对世界形势变化的把握不足，未能全面、准确把握世界形势发展趋势，同时在分析中国革命运动时未能将其与世界政治的变化相结合，仅仅依靠过往经验，从世界革命角度来指导中国革命运动工作，则其后来遭遇的挫折也就不可避免了。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实践论》写于抗日战争时期，是1937年毛泽东在延安的抗日军政大学所做的演讲。其全面地阐述了认识和实践的关系也即“知”与“行”的关系，一方面是总结革命经验教训，从哲学上分析“左”倾错误的根源，批判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另一方面《实践论》与毛泽东在到达陕北之后的写的《矛盾论》共同阐述了毛泽东对实践和认识关系的分析，且标志着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成熟和体系的形成。

无论是个人还是整个人类，他们对一件事物或是对复杂的世界，都有一种认识，这种认识会影响我们与外界事物的关系，影响我们对整个世界的观察和判断。从中国共产党在20世纪三十年代前后的政策变化来看，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对中共政治路线的影响是深刻而深远的，直到后来随着中共领导核心的改变，中国共产党人才逐步摆脱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束缚，开始用实事求是的思想方法，观察极为复杂和变化万千的世界事务，以及世界政治中的中国与中国革命运动。

参考文献

1：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一卷），1951年，人民出版社。

2：李立三，《新的革命高潮前面的诸问题》，1930年5月15日。

3：牛军，《从延安走向世界——中国共产党对外关系的起源》，2008年8月第1版，中共党史出版社。

4：《中央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1931年9月22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7册，中共中央党校1991年版。

1.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一卷），1951年，人民出版社。 [↑](#footnote-ref-1)
2. 李立三，《新的革命高潮前面的诸问题》，1930年5月15日，《布尔什维克》第三卷，第四、五期。 [↑](#footnote-ref-2)
3. 牛军，《从延安走向世界——中国共产党对外关系的起源》，2008年8月第1版，中共党史出版社，第8页。 [↑](#footnote-ref-3)
4. 《中央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1931年9月22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7册，中共中央党校1991年版，第421页。 [↑](#footnote-ref-4)